

# 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动力分析\*

## ——精英利他假设与集体行动逻辑

宋丙涛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4)

**内容提要:**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曾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然而,由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未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本文试图在集体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从人类更为原生的种群生存目标出发,用公共产品的供求原理解释国家治理结构转型过程中的集体行为逻辑与经济效益逻辑。特别是,本文将用公共产品需求结构的变迁来解释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动力,用公共产品需求的冲突来解释现代国家治理的困境。本文的结论是,治理结构的转型实际上就是公共经济体制的变迁,作为一种应对生存挑战的尝试,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构建成功,依赖于决策效率与执行效率的同时提高。并且,新体制是社会精英为应对挑战而有意构建更为有效的公共经济体制努力的产物,是各类结构相互竞争、优胜劣汰的社会演化的结果。但在这个过程中,精英的利他行为模式为治理结构转型的动力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结构转型;国家治理;公共经济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6)12—0001—15

### 一、问题的提出: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理论困惑

尽管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与共同追求,但对传统国家结构向现代国家体系转型过程的认识,学术界依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不仅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学家们缺乏对转型细节与路径的关注,而且强势的经济学家们在国家治理结构分析方面的表现同样无法令人满意。以致于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均导致了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制度本身“正义性”的质疑(Piketty, 2014),而政治家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现代“非理性”行为<sup>①</sup>,也不断在现代国家内部的学术界激起关于现代经济学“理性神话”(Caplan, 2007)的反思。

确实,尽管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相应的经济理论研究却并未取得太大

进展,经济学家不仅对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缺乏兴趣,而且对作为现代文明内核的现代国家经济内涵的解释也乏善可陈(宋丙涛, 2015)。作为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志得意满地停留在对现代国家内部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进行精细化描述的层面,但对现代国家诞生过程的解释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曾经名满天下的新制度经济学(诺斯, 1994; 诺斯、托马斯, 1999; Acemoglu & Robinson, 2008; Ogilvie & Carus, 2014)尽管将制度的内涵从微观的产权扩展到了宏观的议会,从开放性、包容性制度扩展到了普适性制度,但他们的研究同样过于关注抽象的意识形态,而对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经济内涵与构建路径没有太多关注,因而他们既未能解释符腾堡与荷兰早期强势议会在经济增长与

收稿日期:2016-09-09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黄河文明演变的公共经济学分析”(14JJD790012)。

作者简介:(1965-),男,河南辉县人,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是制度变迁、东西方文明对比及公共经济理论, E-mail: sbingtao@hotmail.com。

<sup>①</sup>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抬头与政治上右倾主义的泛滥。

国防保护方面的失败 (Mokyr, 1999, 2000; 爱泼斯坦, 2011; Ogilvie & Carus, 2014; Song, 2015), 也无法解释高调的普适性制度 (比如美国的民主制度) 力图用非经济理性的政策 (Caplan, 2007) 来拒绝或排斥其他经济主体享受现代经济制度带来的收益所引发的全球性集体利益冲突。

当然, 现代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未能在解释现代国家治理结构转型方面取得进展, 主要是由于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处于主流核心地位的现代经济学, 既未能对发源于英伦三岛、成熟于美国的现代国家结构的起源过程进行认真的分析, 又未能对长期屹立于东方的古代国家的治理结构予以全面的研究, 从而导致了作为国家治理结构核心内涵的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的经济意义<sup>①</sup>的误解。因此, 在经济史学家不断还原现代文明诞生真相的过程中 (霍布森, 2009; 赵林, 2005), 现代经济学家未能在现代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解释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正是在这个结构与转型理论缺位的背景下, 中国的体制改革才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而鉴于早期的改革源于对传统宏观治理结构效率低下的深恶痛绝, 因此, 对微观市场经济的引入与对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经济学的崇拜, 自然成为当时的最好选择。但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效率并不能弥补国家治理结构在提供生存保障公共产品方面的缺失, 国家治理结构的缺陷很快使得集体利益冲突升级, 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与思想混乱, 甚至会给现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显然, 一个能解释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经济内涵与转型路径的理论, 对于防止我国的改革陷入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僵化倒退的两难局面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当然, 这个新的理论体系不仅要能解释西方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在传统国家内部的诞生, 而且能解释东方传统国家治理结构长期延续的经济原因, 从而可以为中国在传统国家的基础上进行的现代化

转型努力提供智识上的贡献。为此, 本文首先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对国家治理的内涵进行解读, 然后以公共产品需求结构变迁的规律为依据, 分析了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型的经济效率逻辑、生存竞争逻辑、集体行动逻辑与动力机制路径。本文的研究表明, 农耕国家与现代国家一样, 都有比较成功的治理结构, 但二者又有所不同, 传统国家因为提供了内部秩序与执行效率而带来了人口的急剧增加, 却失败于国防能力的相对不足; 现代国家由于其国防能力与发展型公共产品的供求吻合效率而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工业革命的爆发, 但却因缺乏利益协调的哲学理论与治理机制, 而不时被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冲突拉回到种群生存竞争的原点。

## 二、国家治理结构的经济学解释

### 1. 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国家治理结构的漠视

尽管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很好地揭示了市场机制建立之后的私人经济的运行规律, 但作为市场机制构建者 (爱泼斯坦, 2011) 的国家治理结构的内涵却迟迟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众所周知, 斯密在《国富论》中, 一方面虚构了商业社会中具有互通有无倾向的经济人 (Morgan, 2006); 另一方面, 他又分析了关注现实生存目标的国民, 并指出, 对现实中的国民而言, 国防是比富裕更为重要的目标 (Olson, 1963), 因此, 即使对古典经济学来说, 国家治理结构也是一个比市场交易结构更为重要的制度设计。

确实, 现实中的国民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放弃所谓的市场经济理性 (Caplan, 2007), 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求助于集体行动, 因此, 普适性的人类经济学就必须从人类的集体经济行为入手进行分析。特别是, 这些市场经济学不能解释的国家经济活动与国家治理结构不仅是先于市场经济而独立存在的, 而且还决定了市场交易结构本身演进的成功与失败。

事实上, 在人类社会早期, 由于技术的限制, 个

<sup>①</sup>重农抑商的重农主义和重视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 只是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政策的理论总结。只不过, 在目前流行的以斯密为奠基人的现代市场经济学体系中, 重农主义是作为重商主义的对应理论而出现的。或者说, 在欧洲中心论的体系中, 重商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先于重农主义而出现的。但如果研究者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欧洲中心论的范畴, 那么, 在全球的范围内, 无论是作为一种公共经济学思想, 还是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策, 重农主义或重农抑商的理念早就在古希腊与先秦中国存在了。

人单独提供自己的生存保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集体生存保障就成为人类追求的第一个必需的公共产品。由于公共经济学认为所有提供公共产品的经济活动都是公共经济行为,因此,几乎所有的人类经济活动实际上都是从公共经济行为开始的,而公共经济行为模式的制度化则标志着古代国家治理结构的尝试(张岩,2004)。从游牧民族狩猎过程中的部落会议到农业社会的治水组织,从中国远古时期的山祭水祭体系到夏商周的国家雏形(张岩,1999,2004),都是人类早期社会治理结构的尝试。只是当人口由于生存能力的提高而出现大规模增长时,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才成为生存保障的主要挑战,原本服务于天人关系的天命理论才借助于天体历法时间结构而转化为人间社会治理结构(张岩,2004),于是,兼顾集体内外复杂的群际关系的国家治理结构(张岩,2004)与公共经济机制才成为人类社会治理结构探索的主流。

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人口的增长首先带来的是内部协调的困难,不同意见的协调与统一在人数增加的背景下逐渐成为不可能,于是,人类原有的社会集团开始分裂。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与集团的不断分裂,集团之间的资源占有方面的竞争关系开始成为主要的挑战,地缘政治关系开始紧张。尽管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的进步(比如工具改进)不断缓解着这个地缘政治关系,但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挑战与应对,开始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治理结构演化的主要动力。随着群体竞争的加剧,各个群体的有识之士都先后认识到,群体的大小对群体的集体生存能力或竞争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于是,各个人类社会群体的内部扩张与外部兼并就成为人类社会治理结构演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应对外部关系的主权结构很快就成为各个早期社会结构的核心内涵,而以群际关系协调为核心的希腊哲学、中东宗教与东方儒学的出现,正是各地精英不断探索治理结构的努力结果,而规范的国家治理结构正是这些理论应用的实践结晶。

但无所不包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对这个孕育了人类文明的社会治理结构变迁过程表现出了长

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漠视,只有新制度经济学算是一个勉强的例外。然而,新制度经济学(诺斯,1994;诺斯、托马斯,1999)纯粹从产权结构的角度对现代国家兴起的解释同样无法令人满意(奥尔森,1995),于是,以伯尼(Bonney,1999,1995)、奥布莱恩(O'Brien,2012,2011)、爱泼斯坦(2011)为代表的财政史学家,才纷纷强调国家主权与财政体制在现代国家诞生中的作用;以斯特雷耶(2010)、蒂利(2007)为代表的政治史学者,才会关注现代国家的诞生与现代经济的关系。而本文则试图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人类的集体生存竞争行为与国家治理结构构建的经济学含义,并对市场交易机制的诞生与国家治理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做出解释。

## 2. 国家治理结构的公共经济学内涵

当然,无论是社会内部的合作还是群体之间的共存,都是在集体生存竞争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人口不断增长而资源相对稳定的背景下,要实现这个人类的共同生存状态,就需要有效的社会治理结构安排。幸运的是,以单向强制为基础的传统国家治理结构与以双向反馈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先后取代了以神话、迷信与宗教为基础的低效的社会治理结构。

确实,在规范的公共经济机制出现以前,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人类都尝试了摆脱族群与部落模式而实现公共经济活动效率提升与生存能力提高的各种可能治理结构(比如,神权国家、封建庄园和部落联盟等)。然而,无论是何种尝试,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分工是这些治理结构构建的核心。

在远古时期,私人经济活动与公共经济活动之间的社会大分工,是作为社会治理结构的制度化进程而出现的。但分工的出现使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无法自己养活自己,必须从公共产品的消费者那里获得一定的生活必需品作为回报,于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交换才成为必要,而这个交换就是经济学中的财政活动。社会分工与专业化基础上的规范的社会治理结构的出现,使得人类的公共经济活动效率进一步提高,人口增长的速度同时加

<sup>①</sup>实际上,对于中国考古学界而言,无法在二里头等前商文化遗址中发现足够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在殷商之前存在非血缘的社会治理结构一直是中国文明探源工程难以启齿的硬伤。

快,特别是,文字的出现提高了有关社会治理结构知识传递的效率,城墙的出现加快了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治理单位出现的可能,于是,超越族群血缘关系的国家治理结构的诞生才成为可能<sup>①</sup>。

对于最先出现的古代国家治理结构,尽管学者们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论,但却都有着类似的看法,比如,古代国家是一种复杂的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治理结构(张渭莲,2008),而以生存保障公共产品为供给对象的专制国家是古代国家最为典型的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古代国家治理结构的判断才有了共同的认知基础。同样,关于现代国家的治理结构,人们也有着类似的观点,比如,有人把现代国家总结为一个拥有历史久远、空间固定、超越个人之上的制度与权威的政治组织(斯特雷耶,2010),甚至强调了文字对于国家治理结构延续、司法与财政制度对国家意识出现的重要意义(斯特雷耶,2010)。他们指出,以市场秩序公共产品为供给对象的公共经济机制的出现预示了现代国家的诞生。

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只有以规范的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以可共享外部性的连续区域为边界的非血缘型公共经济机制——国家治理结构的出现,才因为提高了公共经济活动的效率,而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志。因此,国家治理结构的制度核心是公共经济机制,国家治理的效率基础是专业化社会分工。毋庸置疑,古代传统国家的诞生是人类社会治理结构变迁史上最为伟大的突破,尽管大多数古代国家的治理结构都是专制的,但它仍然标志着第一次典型的公共经济革命的爆发。而以英国宪政国家的出现为标志的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推动了英国产业革命的爆发,并标志着第二次典型的公共经济革命的爆发。当然,鉴于现代国家治理结构拥有决策效率方面的巨大优势,特别是在提供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市场机制<sup>①</sup>方面的有效性,向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正在成为追求经济发展目标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目标。

然而,也必须看到,在关于国家治理结构的讨论中,欧洲中心主义者一直试图把东方的古老国家形态排除在外,而只强调欧洲现代国家的治理结构模式。一方面,他们无视东方的经验,声称在欧洲之前、之外并不存在另一个国家治理结构的模式,中国和其他非欧洲国家的经验被视为不相关(斯特雷耶,2010);另一方面,汤因比、亨廷顿、韦伯等又试图用文化、宗教等社会治理结构来代替国家治理结构,然后从文化的角度强调欧洲国家治理结构的优越与独特。

事实上,作为人类共存的制度基础,国家是一个超越血缘、超越宗教的地域性公共经济机制与社会治理结构。因此,与当代西方学者对近代欧洲民族国家诞生的强调不同,国家治理的经济内涵从来都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经济共同体的族群构件,而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公共经济单位的制度内涵。确实,东方早期的国家治理,只以地域为界,不以宗教与血缘为基础,强调公共产品消费权的普适性,从而使得公共产品的外部性问题得以解决,使得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效率得以实现。因此,平等对待辖区内的所有居民是所有古代东方国家的公共经济机制的基本内涵与典型特征,因此,古代东方国家具有宗教与血缘上的普适性,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连续性,因而有所谓的农耕文明的超级同化能力(赵林,2005)。相反,近代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民族国家概念的提出与宗教意识的强化,不仅引发了人类历史最为惨烈的国际战争,而且导致在生存资源充裕无忧的背景下宗教冲突、民族矛盾与国家治理结构危机,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在发达国家内部频频爆发。

总之,本文认为,国家治理应该具有典型的非血缘特征与空间连续特征<sup>②</sup>,国家应该为辖区内所有人提供非歧视性的基本的生存保障等公共产品。因此,本文认为,那些以血缘为基础的庞大帝国,比如早期的元帝国,或者那些以宗教为基础的军事帝国,比如伊斯兰教帝国、基督教的西班牙帝国,甚至包括那些以城市商人为服务对象的商业共和国,比

<sup>①</sup>爱泼斯坦(2011)明确强调,市场机制不是自发产生的制度,而是必须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

<sup>②</sup>尽管各个国家在征税原则上是否采用居民管辖权规定各异,但地域税收管辖权确实没有任何争议的基本原则。见王传纶,朱青. 国际税收[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如威尼斯与荷兰,无论是如何地穷兵黩武、战无不胜,都难免成为短命帝国,而无法成为真正的可持续国家。更有甚者,仅仅以血缘为基础来提供公共产品的希特勒第三帝国、欧洲移民建立的早期美国、种族隔离的南非,甚至根本不具有任何国家治理的内涵。相反,中国的汉唐、古印度、古埃及与古希腊的多民族、多宗教共存体制,才是真正的具有普适性的国家治理结构。换句话说,国家治理的核心经济内涵是公共服务对象的普适性,国家治理结构的优势是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而效率优势的表现是公共经济机制在空间与时间上的连续性。

### 3. 基于公共产品提供的治理效果测度

事实上,由于早期的公共产品主要是集体生存保障,因此,本文认为,公共经济机制或国家治理结构是否有效的判断标准就是人口的规模与密度。实际上,与今天的GDP相类似,早期的各个文明古国都非常重视作为治理效果指标的人口的统计,并以人口为基础来推测国家治理结构的效率(肯尼迪,1986)。需要强调的是,与依赖主观的、以人类发行的货币为计算单位的当代GDP不同,人口的统计更为客观,因此,历史的资料更为可信,以致于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年度之间的调整就可以进行直接的纵向的历史比较<sup>①</sup>。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都尝试用人口总量与人口增长速度来界定人类社会结构演化的阶段。

例如,人口史学家利维巴茨(2005)就指出,人口是繁荣发展的天然尺度。旧石器时代的100万、新石器时代的1000万、青铜时代的1亿、工业革命时期的10亿,还是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中毫无疑问会达到的100亿,显然不单单表现了简单的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增长,而是代表着不同的公共经济体制的效率水平与国家治理结构的发展阶段。他还强调,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的农业革命前夕,人口的年增长率为0.008%;工业革命爆发前1750年左右,人口的年增长率为0.064%,以及1950年代的0.59%,同样标志着国家治理结构发展进程的差异与公共经济效率的高低。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的

数据(2007)印证了这个规律,他认为,治理结构的转型升级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以至于农业社会的生存能力达到了游牧狩猎社会的150倍,而截至到目前的工业社会的人类生存能力又是农业社会的130倍(克里斯蒂安,2007)。

很显然,人口的数量与增长速度清晰地展示了社会治理结构演化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几千年来人口数据一直是古代国家的主要统计指标。只是到了20世纪初,当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彻底摧毁了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乡村、教堂、祠堂等),人口流动对政府提供更大空间范围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依赖才引发了对就业的关注,于是,以测度政府提供就业能力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总量才开始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才成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测度指标。

当然,在前国家时期,人口的密度与规模几乎完全决定于一个地区的技术发展水平。但在国家产生之后,人与人的和谐共存能力很快成为决定人口数量的主要因素,特别是,人口的数量与战争的爆发规模和频率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以东亚大陆为例,尽管存在着统计误差,但秦汉以来的人口数量随着战乱的频发而减少、随着秩序的稳定而增加几乎成为一个规律,因此,和谐统一与社会安定成为文明社会的典型特征。此外,尽管3000年前东方统一国家的出现对战争的负面影响产生了一定遏制作用,从而带来了人口总量与人口密度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国家的出现虽然削弱了战争的频率,却并没有完全消除战争的影响。在距今3000~300年的国家治理时代,百年人口增长率曾经在-3.18%~26.49%之间剧烈波动(克里斯蒂安,2007),这表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对人口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技术进步的影响。只是到了近200年以来,国家间战争的负面影响才逐步得到控制,人口百年增长率迅速从40.29%、71.28%、139.74%直线上升到462.42%,从而表明人类社会文明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很显然,国家治理结构的存在

<sup>①</sup>相反,在统计国内生产总值时,不同个人的偏好的横向比较问题(穷人与富人的3元),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的偏好比较问题(年轻时与年老时的3元),偏好的加总问题,偏好的可数性问题(比如生存偏好与享受的对比关系是否存在不可数的无穷大)等都严重影响了公共经济机制的效率比较。

与内部战争的减少成为文明社会的重要特征,而能够衡量这个特征的测度指标就是人口的总量与人口的密度。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存在着歧视性误解,特别是那些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学者更是误解了现代国家的内涵与意义。他们一方面用战争的成果来标榜自己的政治文明;另一方面,又试图用人均GDP来突出其现代国家的经济优势。实际上,在建立普适性的公共经济机制之前,西欧特别是西、葡、荷、英在全球进行的殖民掠夺战争,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的政治文明意义,只是在建立了不分民族、不分教派的统一的公共产品供求机制之后,才进入了现代国家的阶段。因此,尽管对外战争是现代国家的肇始因素,但战争本身并不是文明,人均收入也不是现代国家的标志,相反,以抑制战争为目的和谐型国家治理结构,才是现代文明与现代国家的标志。

正是由于不理解现代文明与现代国家的经济内涵,美国经济史学家克拉克(Clark, 2007)才会对人类从人均收入更高的狩猎、采集与畜牧社会变为人均收入更低的农业社会感到困惑。他甚至用1800年的英国人均收入超越今天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史实,来影射农耕文明的落后与传统国家治理的无效,甚至认为传统的国家治理结构还不如公元前1万年左右的狩猎时代的社会治理结构更发达。在这些缺乏历史感的现代经济学家们看来,古代国家与农耕文明的出现与长期持续反而成了一个需要解释的例外。

其实,克拉克对欧洲社会早期的低效治理能力并非一概不知。克拉克知道,1580—1800年欧洲城市人口的高死亡率,无论如何也无法成为高效治理结构的特征。他承认,如果不是有移民不断进入,欧洲的城市早就消失了(Clark, 2007)。被后来人视为现代文明发源地的英国伦敦尤其如此,甚至可以说,伦敦的人均高收入是以高死亡率为条件的。但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测度体系——人均国民收入来评价历史上的治理结构,使他误解了现代文明与现代国家的内涵与意义。他认识不到,这样的高死

亡率基础上的高人均收入实际是社会结构尚未进入国家治理阶段的象征。用今天的现代国家测度指标来倒推历史上的社会治理结构发展水平的事后诸葛亮式的评价方式<sup>①</sup>,使得经济学家们误解了现代国家的意义与治理结构发展的历史真相。

### 三、国家治理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公共经济逻辑

#### 1. 治理结构转型的经济效率逻辑

实际上,人类社会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从来都与人均收入没有太大的关系,但现代经济学关注的效率却始终是社会治理结构转型的内在要求。比如,在传统的古代社会中,正是社会管理活动的内部分工与细化提高了生存型公共品的供给效率,从而才使得以人口为测度指标的早期国家成为一个古代文明的普遍现象。

然而,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依赖于作为治理结构核心的公共经济机制的运行效率,而公共经济机制的运行效率又分为执行效率与决策效率两个层面。其中,执行效率主要取决于国家常备军、稳定税制与科层官僚体制的出现,而决策效率则主要取决于早期的贵族民主遗留下来的议会与讨价还价机制。此外,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一个是更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

由于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公共产品的需求只有集体生存,结构没有变化,需求偏好没有意义,因此,各个不同地区的古典文明的尝试才都表现为以执行效率为主要内涵的公共经济机制或国家治理结构的构建。正因为如此,中央集权制国家才有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以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与官僚体制为治理结构基础的中国古代文明,才成为传统农耕文明中的佼佼者。

然而,为什么在传统的农耕文明获得成功之后,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改进就再也没有获得太大的进展?原因在于公共经济活动本身的属性。

首先,社会分工条件下公共产品供求双方的时空分离导致了公共经济效率提高的困难。市场效率的提高严重依赖于交易发生时供求双方之间的讨价还价、产品清点、质量检查、货款支付在空间与

<sup>①</sup> 见和文凯的博士论文(He, 2013)及宋丙涛(2014)的书评。

时间上的同步性,一旦供求双方不能使得这个同步性得到保证,交易的效率就严重依赖于供求双方之间的信用。而在社会分工出现之后,公共产品的交易恰恰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先付款后交货的时空分离的交易,且纳税人与政府之间一向没有很好的信用记录,因此,公共经济效率的提高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在消费者内部对这些产品的产权进行界定分割是不经济的,从而使它的消费者从来都只能表现为一个群体。作为群体的需求者与供给者的讨价还价需要解决集体代理人的选择问题,即谁来代表群体与供给者进行利益攸关的谈判<sup>①</sup>。由于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因此,在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结构出现之后的公共经济效率的提高,就无法从作为消费者的纳税人那里获得必要的压力。

最后,执行效率对强制力的需要与消费者监督的矛盾,导致了公共经济效率提高的困难。由于供求分离的国家治理结构,没有哪个需求者愿意在还没有看到产品以前就支付产品的价格,而代理问题与搭便车的可能性更进一步阻碍了购买者主动付费的动机。因此,与新制度经济学对供给者掠夺的可能性的强调不同,爱泼斯坦(2011)认为,一个拥有强制力的国家治理结构的出现同样是很困难的。当然,大多数成功的文明社会都构建了国家治理体系,并采用了将强制力(常备军)赋予国家的办法,以确保先收费后提供公共产品的交易模式能够进行下去。然而,这个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结构很容易出现合同违约的情况,也就是拥有了常备军的政府在获得付费之后提供劣质公共产品,甚至不提供公共产品,也就是存在政府变成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黑帮的可能性(诺斯,1994;奥尔森,1995)。而这个执行过程中的强制力的巨大副作用,正是人类历史上国家治理结构一再出现极端无效状况的原因,也是大多数古代国家会出现衰落、消亡或改朝换代现象的背景。

总之,由于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特征,在社会分工与财政体制出现以后,在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

交换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提供者违约的行为,这使得公共经济的效率提高一直没有出现,当代人期待的现代化转型也就一直没有发生。此外,由于经常性税收与常备军的出现是执行效率提高的关键,而常备军对强制力的绝对垄断又严重抑制了新治理结构出现的可能性,因此,直到现代国家出现的近代,与交易效率提高密切相关的讨价还价机制、甚至决策机制本身都一直没有成为社会精英关注的焦点,只有在那些偏远的农耕文明薄弱的地区,所谓的新治理结构才会作为前国家时代部落社会的遗留而获得尝试的机会。

## 2. 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生存竞争逻辑

正如汤因比所言,文明的诞生是各个时代的社会精英们应对挑战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效率的提高本身从来都不是社会精英们思考的目标,只有当效率的提高与应对挑战的任务密切相关时,与效率提高密切相关的决策机制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精英们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正是面对着不同的挑战,人类才先后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公共经济机制或国家治理结构。但由于早期公共产品需求结构的单一性(生存保障)特征,公共产品的偏好显示不重要,再加上议会模式对执行能力的不良影响,因此,尽管贵族集体决策模式是最早的公共经济决策机制与社会治理结构,但成功的传统农耕文明都先后放弃了这个无效的社会治理结构而转向了极权专制结构,比如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等。因此,早期的国家治理结构一直没有在决策效率的提高与供求结构的吻合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相反,早期的农耕文明精英们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公共经济的执行效率的提高方面。

然而,在一些农耕条件薄弱的地区,比如英格兰,当新的挑战出现以后,比如小冰期带来的农业衰退,南欧诸国对英格兰羊毛的需求使得重商主义成为一种新的生存策略或国家战略。由于重商主义的策略对发展型公共产品提出了新的要求,再加上有利于经商的公共产品需求结构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因此,与需求的偏好显示相关的决策机制的

<sup>①</sup>如何解决这个代理人问题,几乎成了人类历史所有圣贤的哲学思想的追求目标,明君仁政曾经是全球智者的共同选择。由于代理人也是一个经济人,也具有自己的利益与偏好,因此,确保代理人去体现集体内部千方百计协调出来的偏好,也是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目标,更不用说效率。

效率改进才逐渐成为社会精英们的关注焦点,现代国家治理结构才作为一种应对挑战的尝试而进入社会精英的视野。

关于现代国家治理结构或公共财政机制的构建,尽管传统文明古国拥有更为久远的历史,但由于以贵族集体决策的方式存在过的公共产品偏好显示机制曾因影响执行效率而遭到抛弃,因此,农耕文明成功国家中的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构建就显得格外缓慢而痛苦。相反,在偏远的农耕文明相对不成功地区,作为制度的古化石而遗留下来的封建贵族治理结构,为讨价还价的预算提供了平台,从而使得公共产品偏好显示与决策机制的出现更为容易。于是,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结构——公共财政体制终于在旧体制的内部产生了。

该新体制偶然地将议会与类似市场机制的预算体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构建了以供求双方讨价还价为基础的公共产品有偿交易机制,即后来所谓的公共财政体制(张馨,1999)。在该体制中,谁交的税多,谁就有权发言并参与决策,而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的人可以不交税。这样一种大纳税人主导的国家治理结构,因为合乎基本的成本收益相对应与偏好显示的现代经济学原理,而极大地提高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发了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工业革命,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以及国家战胜他国的能力。同时,该治理结构一方面在交税的富人与政府之间建立了一个双赢的机制;另一方面,它还能让穷人免费享受一些公共产品,因而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并成为全球精英追捧模仿的对象。

然而,需要清醒的是,第一,富人参与决策的议会机制尽管有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但并不一定能满足所有的公共产品需求。尽管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代言人,富人确实更为了解发展型公共产品的需求,也有动力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型公共产品,但作为一种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这些决策者并不会自动关心弱势群体需要的生存保障公共产品的提供,因此,现代国家中弱势群体生存与精英群体发展争夺资源的冲突仍然存在,甚至还会在一定的条件下恶化。第二,基于决策效率提

高的公共财政体制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执行效率的提高不重要。事实上,就像爱泼斯坦(2011)与奥布莱恩(O'Brien,2012)的英国财政史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英国的国家主权与行政能力的有效,同样是英国现代国家成功的基础。忽视政府执行能力,只是强调宪政决策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从来都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成功,波兰与荷兰早期的议会宪政体制正是因为缺乏统一主权的执行效率而遭遇了亡国的结局。换句话说,现代国家治理的成功既依赖于决策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执行效率的提高。因此,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必须既能提供生存竞争需要的公共产品,又能提供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

然而,近代以来,尽管生存保障仍然是现代国家政府的首要目标,但现代经济的发展很快将曾经是生存竞争手段之一的重商主义与市场经济发展本身视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并在重商主义的市场扩张追求中实现了以能源利用形式改变为内涵的工业革命。正因为此,现代国家才带来了人均收入的增长,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讨论才逐渐脱离了决策效率与执行效率的争论,而滑入了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人均收入高低的争论。

但由于人均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的经济意义远不如人口增长本身那么客观确定<sup>①</sup>,再加上现代国家追求的发展目标的不可度量性以及不同的目标之间(如穷人生存需求与富人发展需求)是否可通约、是否可加总等测度问题的存在,因此,学者们对现代国家治理结构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一直争论不休,以致于发达国家将人均GDP作为现代国家成功与否判断标准的做法也一直饱受争议(Deaton,2016)。

实际上,正是由于发达国家缺乏对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经济内涵的准确理解,他们才未能很好地协调不同公共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更未能建立一个逻辑一致的协调原则来处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和谐共存的问题。再加上,这些自誉为现代文明导师的发达国家还无法彻底摆脱生存竞争阴影的影响,因而无法避免对本集团公共利益追求与偏向<sup>②</sup>,因此,一方面,他们的政治理念宣传无法得到

<sup>①</sup> 价格是以需求偏好为基础的,而偏好强度的横向、纵向比较不具可操作性。

<sup>②</sup> 这里既有公共产品在国界之间的分配问题,也有公共产品在不同阶级、不同血缘、不同宗教集团之间的分配问题。



竞争对手与内部成员的认可 (Piketty, 2014; Caplan, 2007)<sup>①</sup>;另一方面,他们纯粹以竞争能力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与以竞争能力为导向的治理结构效率,也无法让人心悦诚服,更无法在直觉上让人把它和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文明联系起来。

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成功,不仅没有使以集体生存竞争为目标的公共经济行为完全消失,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集体生存竞争。于是,不仅国家之间不断在自然资源足以维持所有人生存的条件下引发了许多不必要的战争,而且还在许多国家内部引发了工薪阶层与资源垄断阶层的对抗 (Pekitty, 2014, 2015)。也正是由于发达国家治理结构的这些缺陷,对生存权利有所担忧的弱势群体,才一方面不断在现代国家内部引发持续的动荡 (美国占领华尔街、泰国红衫军、中东民主浪潮);另一方面,也不断在国际政治体系中泛起国内市场保护与自然资源竞争方面的民族主义浪潮 (西欧纳粹萌芽、东亚领土争端、东欧领土争端等)。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就业的强调与现代市场经济学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正是集体生存竞争与市场机制效率要求相矛盾的具体体现。因此,尽管所谓的现代文明理念已经席卷了全球,但现代国家的治理结构并未席卷全球,国内社会危机的可能与国家间战争的威胁并未完全消失。

### 3. 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集体行动逻辑

当然,鉴于经济效率的影响,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型确实遵循着从无序到有序、从低效到高效的普遍规律。即公共经济机制效率的高低决定着国家治理结构诞生与转型的可能性,即低效的治理结构会不断被高效的治理结构所淘汰。而淘汰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一是早期的异族肉体被消灭;二是当代的国家治理结构的升级换代。其中,前者是有效古代国家对无效的前国家社会结构的替代,后者则是从低效古代国家治理结构向高效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然而,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肇始逻辑却始终蕴含在以集体生存竞争为目标的集体决策行为之中,因此,对人类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蕴含

的经济理性做一界定性描述就是必要的。

首先,本文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能力(智商或情商)有高低、品德(德商)有差异的四种人组成的。即能力高的精英与能力差的大众,利他的高尚人与利己的经济人。当然,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比如能力既取决于基因传递,也取决于学习。学习可以改变能力(智商与情商),也可以改变品德(德商)<sup>②</sup>。于是,社会上的四种人可以描述为:利他的精英,自私的精英,利他的大众,自私的大众。

其次,生存目标决定集体经济行为,技术条件与资源环境决定行为选择的空间。如前所述,人类社会的经济目标实际上分为两类,即生存目标与发展目标。并且,对任何人来讲,生存目标都是一个优先目标,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去追求发展的目标。而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每个人的独立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如何用集体行为的方式来适应不同的环境并确保种群生存延续下来,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凝固在基因、文化 (Kosfeld & Rustagi, 2015) 与历史记忆之中的集体追求。确实,如果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都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像 Henrich 等 (2001) 的拓展性实验所探讨的那样,而不是只考虑二战以来在欧美发达国家生活的人民的经济行为,那么追求集体生存目标的公共经济行为才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主流。于是,集体主义文化就会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行为模式的总结,而影响这个行为模式的外部环境与技术条件就会成为社会精英们关注的焦点。当然,这个外生的环境在人类处于相互隔绝的早期仅仅限于自然环境,等到人口的增加使人与人的资源竞争不可避免时,这个外生的环境才逐渐演变为地缘政治环境,并成为精英选择制度的依据。

第三,精英选择制度,制度影响大众。即使在一个追求集体生存目标的集体主义文化中,面对原有的制度环境,各个个体的行为模式也并不一致。本文认为,大多数人的经济行为受惯性控制,只有少数的精英才会依据掌握的信息进行理性的分析与决策,因此,关注集体行为的人们不得不把自己

<sup>①</sup> 尚未转型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既不满意领先者意识形态的孤芳自赏,也不满意领先者对公共利益垄断。其内部成员则在经济机会主义(比如在落后时对自由贸易的反对与领先时对自由贸易的推崇)中无所适从。

<sup>②</sup> 实际上,早期的哲学家孔子、柏拉图等都是在试图用教育的方式来改变人的德商,并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的分析重点集中在少数精英的公共经济行为上。换句话说,无论环境决定的群体竞争格局如何变化,任何一个社会内部的所谓制度变迁过程,都是该社会内部的精英面对着新的挑战尝试新制度的主观选择过程。只不过有的尝试恰好适应了当时的环境需要、解决了当时的问题而得以延续,有的尝试因不符合要求而被淘汰。历史上,成功的有理性的精英往往被尊为神,但不是所有的个体都是有理性的精英,所以,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个体主义方法不能解释国家治理结构的由来与治理结构的转型。

第四,精英具有认知理性,社会具有演化理性。作为决策者的精英为何能做出理性的选择,并引导人类社会的治理结构向着高效的方向演化?答案在于社会的演化理性与观察者的视角局限。

事实上,尽管不同的精英拥有不同的机会成为成功者,但人们观察到的精英的选择,几乎都是成功者。因为优胜劣汰的社会只是保留成功者,失败者很难被人们观察到。而理性的精英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因而有更多机会被人们观察到。因此,人们看到的历史过程实际上只是一个历史真相的局部而已<sup>①</sup>,是社会演化的结果而已。从结果来看,各个成功的群体中的精英,都是具有认知理性的幸运个体,他们不断改善自己的认知能力,并在已知的方案中选择了最优。

而当一个制度在尝试中获得优势之后,不仅本群体的人会采取一切措施试图将这个生存经验传递给后代,而且外部的竞争对手与旁观者也力图模仿这个经验。因此,作为成功榜样的国家治理结构,更容易保留下来并得以扩散。当然,鉴于早期生存竞争的排他性,作为生存经验总结的制度结构,传递过程往往具有十分神秘的垄断性与排他性特征,从巫术、祭祀、图腾仪式的神秘性,到对决策

参与者贵族地位与财产数量的要求,治理结构的传承往往伴随着绝对的排他性垄断特征<sup>②</sup>。

第五,能力德行随机分布,竞争结果优胜劣汰。尽管精英有选择制度的能力与理性,但无法肯定这样的精英具有追求群体生存目标的利他倾向<sup>③</sup>,从而愿意选择有利于群体生存目标的制度模式。那么,社会精英何时才会做出利他的努力?精英为何会做出利他的努力?

关于第一个问题,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黄凯南、程臻宇,2008)表明,在个人独立生存不可能的早期,当外部的压力足够大且群体间的人员流动极低时,精英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就会因为需求强烈而盈利丰厚。于是,富有集体荣誉感的利他偏好就可能得到演化,此时利己的偏好就会受到抑制。相反,利己的偏好就会得到演化,集体获取资源的能力就会下降。而以人地关系为对象的技术条件与以集体关系为对象的地缘政治,则决定了群体间竞争带来的压力是否足够大。

关于第二个问题,只要假定,人群中利他偏好与利己偏好的人性(德商)分布是随机的,人群中的能力(智商与情商)分布也是随机的,且异质性是一个基本特征,那么,利他精英的社会演化就可以被推论出来:

由于能力与德行在不同的人身上的分布是随机的,因此,哪一个团队更为适应环境的挑战并不能事先知道。但在远古时期,个人独立地在大自然中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此时,当能力集中在自私的精英身上时,由于有能力的自私精英在内部竞争中拥有遗传优势,从而导致弱势群体趋于消失,从而使该团队因缺乏必要的规模而在集体竞争中处于劣势并最终消失<sup>④</sup>;相反,当能力集中在利他精英身上时,强互惠将会出现。此时,利他的精英在保证自己生存的前提下为集体提供公共产品,靠

<sup>①</sup>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历史上一定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人类生存方式,只是因为失败了,未能被历史所记录而已。

<sup>②</sup>不仅早期的巫术、文字的使用者被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在把法律刻在泥板上、铸在铁板上以前,法律的知情权也曾是贵族的特权。

<sup>③</sup>尽管从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中可以推断出来精英会有更大的利他可能——新增加的财产的边际效用较低,因而自私的激励较低,但这里仍假定精英的利他倾向是正常分布。

<sup>④</sup>叶航等(2006)曾介绍说:“根据鲍尔斯和金迪斯的计算机仿真,一个完全自私的人类族群,由于无法建立稳定的合作秩序,最终会趋于灭亡。”

利他奉献组织内部合作,从而获得足够的追随者并确保在集体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利他的精英有能力对那些不参与合作的人予以惩罚,确保群体的内部凝聚力与外部竞争力。由于德行与能力在精英身上的耦合,该团队在群体生存竞争中不断获胜,最后导致拥有利他精英的社会群体得以保留下来,该群体的精英也愿意在其内部推广利他道德理念,从而使得以利他合作为标志的社会治理结构的道德特征得到演化<sup>①</sup>。利他精英的合作行为不仅确保了自身与群体的生存,而且会激励更多的社会精英模仿他们实行强互惠利他策略。

何况,正如孔子与柏拉图所主张的那样,精英的利他倾向也是可以培养的(张庭、宋丙涛,2015),因此,尽管各个时代的文化精英都知道,集体主义文化与利他主义道德的宣传并不会使所有的人都放弃自利的行为模式。但他们清楚,只要这样的宣传能够影响足够多的精英成为利他的并实行强互惠策略,该社会就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生存下来。特别是在外部竞争压力增加时,这样的宣传对于一个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的构建来说就更为必要与有效。伊斯兰教、基督教、儒教等对集体主义的强调都是这个认知的结果,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与常青藤大学对利他性社会责任的要求,则同样是人类文化精英倡导精英利他努力的一部分尝试。

#### 4. 现代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动力与路径

如前所述,国家治理结构的效率来源于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分工,然而,也正是这个社会分工带来的交易成本上升,使治理结构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遇到了障碍。同时,公共产品需求结构的惰性也阻碍了新体制的尝试。由于传统的生存型公共产品不仅具有量的绝对性,而且还与地缘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因此,从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解释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动力,就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探索方向。

首先,本文认为,作为公共经济体制的国家治

理结构是由公共产品需求结构内在地决定的。在传统的农耕文明阶段,由于公共产品主要表现为单一的需求——集体生存,公共产品需求的表达与协调相对不重要,因此,社会治理结构的探索就主要表现为对执行能力与监督能力的追求。而公共经济的执行能力依赖于规范治理结构的出现(常备军与稳定税源税制),并表现为国家的诞生。这时,经济学上的重农轻商就与具有执行效率优势的集权治理结构一起成为绝大多数农耕文明古国的核心内涵。

其次,重商主义的出现是农耕文明相对落后地区应对生存挑战的努力。在农业条件较差而畜牧业占优的社会中,由于动物食品储存技术的限制,自然灾害对生产的影响与生存所必需的稳定食物供应要求引发了交易与运输的尝试,并在运输条件改进的基础上导致了商业的繁荣,从而使得商业成为一种生存竞争的策略而逐步被这些地区的精英们所认识,于是,重商主义才成为实现集体生存目标的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内涵。

第三,现代国家的出现是重商主义者追求发展型公共产品在国防公共产品需求萎缩条件下的一种机缘巧合。一方面,重商主义的发展使得商人对于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型公共产品的提供有了强烈的期待;另一方面,岛国地缘政治所拥有的国防压力较小的条件,也使得重商主义者的诉求有可能得到满足。而重商主义需要的发展型公共产品又具有种类多、变化大的特点,于是,决策的效率日益关键,对新型国家治理结构的需求日益迫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经济体制中早期曾经存在过的偏好显示机制——部落军事民主才得以旧物利用,并逐步转化为以大纳税人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结构,公共财政体制才逐渐成为现实。

第四,现代国家的治理结构带来了英国的产业革命。实际上,很多人都认识到重商主义带来的市场需求对产业革命的重要性<sup>②</sup>,更强调了市场经济体系对产业革命的催化剂作用<sup>③</sup>。但并非所有人都

<sup>①</sup> 达尔文也在《人类的由来》中指出,“道德水准较高、多数人奉行道德规范的部落”比其他部落更有竞争力。

<sup>②</sup> 旧的生产方式不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新市场的需要,市场需求带来了新的制度,然后又因规模经济而使得技术的变革成为可能。

<sup>③</sup> 市场经济体系产生的资本家或企业家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社会的变革,这是他们的本能与使命。

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商业繁荣都能带来产业革命的爆发的,只有市场扩张与需求拉动导致了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的地方才爆发了产业革命<sup>①</sup>。产业革命的爆发第一次用蒸汽机将全人类联系在一起,从而引发了持续了二百多年的全球范围内以战争为主要表现的集体生存竞争与经济资源竞争。当然,在这个全球竞争的过程中,掌握了新技术的欧洲诸强迅速提高了自己的战争能力,并通过一系列的战争获得了对全球的控制权与统治权,从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国家模仿浪潮与治理结构转型尝试。

第五,现代发达国家在经济资源竞争中的巨大优势,以及它并未放弃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来获取集体生存竞争优势的近代史实表明<sup>②</sup>,对传统的文明古国而言,尽快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是确保民族得以生存、文化得以延续的唯一出路。但现代国家转型的前提,是独立的集体生存保障与国防战争能力,因此,任何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都是在她获得独立的公共产品垄断提供权之后或是在相对宽松的国际地缘政治背景下才能实现的。

幸运的是,由于人类科技能力的迅速发展,人类内部关于资源占有的竞争已经失去了生存竞争的意义,因此,一个和平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出现,一个和平崛起的现代国家也正在成为可能。确实,传统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正在出现新的模式,即内部的多元决策机制与外部的多国协商机制正在成为一种普适性的价值追求与制度尝试。因此,本文认

为,在经济发展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在生存资源的获取不再是一个零和博弈的条件下,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未来发展方向就应该主要集中在弱势群体的生存保障的社会安排(社会保障制度)与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协调机构的构建(国际政治秩序)上,从而使真正的普适性制度得以出现,真正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得到普及。

#### 四、一个简短的结论

总之,本文认为,传统的文明古国与现代的国家治理结构一样,都只是人类文明时间序列中的一种形态,只是农耕文明是更为原初的国家治理结构而已,但农耕文明并不因此而在道德上处于劣势。相反,现代国家在西方的出现,往往伴随了残酷的侵略战争、强烈的血统歧视与顽固的宗教偏见,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是在经过了亿万人的生命代价与近百年的改进之后,才在20世纪中期开始进入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与高效治理行列的。当然,由于国家治理结构要解决的问题具有普适性,因此,作为应对问题的制度尝试,传统国家结构和现代国家结构一样,也曾经是具有普适性的国家治理结构<sup>③</sup>。当然,更为原始的国家治理结构必然被更为有效的现代治理结构取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演化规律<sup>④</sup>。如果承认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其实就是公共产品提供方式的选择与公共经济机制的变迁,那么,在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过程中,人们就既不会有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不会有概念上的文明共存<sup>⑤</sup>。因为一旦新的更有

<sup>①</sup>实际上,以大机器生产方式与能源利用方式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过程是市场扩张带来的需求拉动的结果。而市场的推动力并非来自于变革过程中的技术变迁,而是来自于生存压力引发的国际重商主义的国家竞争战略。在英国的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市场的扩大使英国出现了规模经济条件;另一方面,生产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劳动力的短缺与劳动力价格的攀升,从而使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与能源使用成为一种更为便宜的生产方式。于是,工厂化组织、矿物能源使用与机器的改良才开始在商人追求利润的过程中相继得到开发与利用(宋丙涛,2015)。

<sup>②</sup>例如,发达国家从不愿意对难民等弱势群体开放边界,而只是致力于吸纳强势社会精英,从而导致所谓的普适性制度并不能普惠到所有的全球弱势群体。再如,发达国家非常担心发展中国家的集体生存能力超越自己,因而不断打压任何可能的竞争对手,甚至是对同一个意识形态战壕的小兄弟也坚决不放过,从而导致现代文明的和谐共处几乎难以实现。

<sup>③</sup>不了解文明演变的这些经济内涵与历史背景,亨廷顿却借助于奈保尔之口,在宗教文化的意义上,强调普世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亨廷顿,2002;米勒,2002),并试图依此文化的标准来贬低东方文化的存在意义。

<sup>④</sup>当然,更为有效的文明并不必然是指战争中取胜的国家,而是指更有效地提供了丰富的公共产品的国家。例如,战无不胜的元朝就不代表任何意义上的有效文明。

<sup>⑤</sup>因此,本文既不同意亨廷顿的有意扩大矛盾,也不同意米勒的有意掩盖差异(亨廷顿,2002;米勒,2002)。

效率的国家治理结构出现了,所有的人们<sup>①</sup>都会愿意选择这个新的治理结构。在这一点上,不管是已变迁成功的发达国家,还是尚未变迁的不发达国家,它们之间并不会有的大的分歧。真正有分歧与冲突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资源之争<sup>②</sup>,因为经济资源曾经是各个公共经济机制所要追求的集体生存能力的基础。然而,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秩序与外部的国际关系的反复动荡的事实却表明,在处理经济资源竞争的关系方面,现代国家的治理结构一定还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与缺陷,因此,治理结构演化与制度改进的脚步现在还不会停止,发达国家的现代治理结构还不会带来历史的终结。

当然,现代国家在竞争中的巨大优势已经表明,公共财政体制是一种比传统治理结构更为有效率的公共经济机制,因此,通过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实现现代化转型是一个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不过,现代国家的出现也只是追求集体生存竞争

的公共经济机制变迁的副产品,而并不是道德高尚的西方文化的产物,更与基督教文化或新教伦理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伟大宗教与传统文化都无一例外地有着类似的局部集体主义与利他主义道德诉求<sup>③</sup>,这些道德诉求只是各个时代的精英试图培养足够的利他精英的努力。尽管与正式的制度相比,道德劝善的成功率更低,但传统的文化与宗教确实用此办法培养出了一批批的利他精英,并引领许多民族渡过了生存危机。因此,对于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转型来说,完成公共财政体制的构建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但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构建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仅仅是道德上的传统回归,而是在集体主义道德引导下的利他精英努力构建有效的公共经济制度方面的尝试。因此,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成功,实际上依赖于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精英的利他主义努力,因此,利他道德的倡导与治理结构的构建,对新制度的运转具有同样的必要性。

#### 参考文献:

- [1]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General Laws of Capitalism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5, 29, (1) : 3 - 28.
- [2]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Persistence of Power,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 (1) : 267 - 293.
- [3] Bonney, Richard. *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 1200—1815*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4] Bonney, Richard. *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 [5] Caplan, Bryan.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6] Clark, Gregory.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7] Deaton, Angus. Measuring and Understanding Behavior, Welfare, and Pover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 (6) : 1221 - 1243.
- [8] He, Wenkai.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 England, Japan, and China*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9] Henrich, Joseph, Boyd, Robert and Bowles, Samuel. In Search of Homo Economics: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 (2) : 73 - 8.
- [10] Jones, Charles I. Pareto and Piketty: The Macroeconomics of Top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5, 29, (1) : 29 - 46.
- [11] Kosfeld, Michael and Devesh Rustagi. Leader Punishment and Cooperation in Groups: Experimental Field Evidence from Commons Management in Ethiopi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 (2) : 747 - 783.

<sup>①</sup>当然,各个民族何时认识到这一点,这个民族的精英何时能说服本国的统治集团执行改革方案,不仅取决于这些民族在旧文明中的成功经验凝结成的传统体制的维持与抵抗能力,而且取决于这些精英们对问题本质的认识以及提供的改革方案在多大程度上维持了从事专业化公共经济活动的统治集团的相对地位。

<sup>②</sup>就像商场中的不同消费者竞争相同的私人产品一样,他们的冲突不是对产品本身有成见,而是对产品归谁消费带来的利益有竞争和矛盾。

<sup>③</sup>张庭,宋丙涛(2015)。

- [12] Mokyr,Joe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Netherlands:Why Did It Not Happen? [J]. De Economist,2000,148,(4): 503-520.
- [13] Mokyr,Joel.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Netherlands:Why did it not happen? [R]. The 15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Royal Dutch Economic Association,Amsterdam,1999.
- [14] Morgan,Mary S. Economic Man as Model Man:Ideal Types,Idealization and Caricatures[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2006,28,(1):1-27.
- [15] O'Brien,Patrick. The Nature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n Exceptional Fiscal State and its Possible Significance for the Precocious Commerc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British Economy from Cromwell to Nelson [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11,64,(2):408-446.
- [16] O'Brien,Patrick. Mercantilist,Fiscal,Financial and Monetary Founda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Nation States in the West Compared to Imperial States in the East;Circa 1415 to Circa 1839[R]. 2012CES Conference,Kaifeng,China,2012.
- [17] Ogilvie,Sheilagh and A. W. Carus.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K].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2014,(2A),Elsevier B. V.
- [18] Mancur Olson Jr. The Economics of the Wartime Shortage:A History of British Food Supplies in the Napoleonic War and in World Wars I and II[M].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63.
- [19] Piketty,Thoma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 [20] Piketty,Thomas. Putting Distribution Back at the Center of Economics:Reflections on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5,29,(1):67-88.
- [21] Song,Bingtiao. Institution and Change of the Public Economy:A New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Modern Civilization Evolution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5,36,(1):172-199.
- [22] 爱泼斯坦. 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的国家与市场[M]. 宋丙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23] 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24] 查尔斯·蒂利.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M]. 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
- [25] 大卫·克里斯蒂安. 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 上海社科出版社,2007.
- [26] 费尔南·布罗代尔. 文明史纲[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27] 冯天瑜,杨华,任放. 中国文化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28] 哈拉尔德·米勒. 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M]. 郗红,那滨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 [29] 黄凯南,程臻宇. 认知理性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J]. 北京:经济研究,2002,(7).
- [30] 肯尼迪,保罗. 大国的兴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
- [31] 马西姆·利维巴茨. 繁衍:世界人口简史[M]. 郭峰,庄瑾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 [32] 马克垚. 世界文明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33]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 [34] 诺斯,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M]. 厉以平,蔡磊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 [35] 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陈郁,罗华平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36] 斯特雷耶,约瑟夫·R. 现代国家的起源[M].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37] 宋丙涛. 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英国之谜的解析[M].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
- [38] 宋丙涛. 评 Wenkai He,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England,Japan,and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J]. 台北:新史学,2014,(3).
- [39] 汪丁丁,叶航,罗卫东.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 [40] 约翰·霍布森.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M]. 孙建党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 [41] 张庭,宋丙涛. 孔子与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再比较:基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Z]. 工作论文,2015.
- [42] 张渭莲. 商文明的形成[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 [43] 张馨. 公共财政论纲[M]. 北京:经科学出版社,1999.
- [44] 张岩. 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M]. 上海三联书店,2004.
- [45] 张岩. 山海经与古代社会[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 [46] 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M]. 上海三联书店,2006.
- [47] 赵林. 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变[M].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 An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 Hypothesis of Elites Altruism and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SONG Bing-tao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Center for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4,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forming dynamics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have drawn much of attentions in social scientists. However, with the limitation of individualism methodology the Neo-classic economics has not contributed an elegant framework to discuss it. Starting from group surviving, we analyze the economic logic in collective action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with the law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public goods, in terms of collectivism methodology.

In this paper, we firstly define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with public economic system, then, we interpret the dynamics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shift of demand structure of public goods. In our point, both of the cooperation inside of the group and the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groups are achiev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llective survival competition, therefore,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groups need to develop some effective social structure, with the conditions of the continuing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nd the constant resources. However,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goods supply heavily depends up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public economic mechanism which is the base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public economic mechanism includes the enforcement efficiency and the decision-making efficiency. The enforcement efficiency comes mainly from the coercive power owned by the government or suppliers, which exemplified in the appearance of the standing army, institutionalized taxation, and bureaucracy system, while the decision-making efficiency comes mainly from the check on government exercised by demanders or taxpayers, which exemplified in the parliament or the bargaining system left by the early noble democracy.

In the early stage of human history, the demand for public goods is usually just the collective subsistence, and it is meaningless to let the demanders to show preference of demand because there is no any difference in preference or change in demand structure, therefore, all those efforts to try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different areas embodied in designing public economic system were focused on the enforcement efficiency, that is the cost and the amount of public goods. Just in this meaning, centralism or anarchy has some positive merits, and the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and bureaucracy system become the one of the best st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Basing on this, we conclude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is the change of public economic system, as the result of a try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 to their group survival, not the result of an effort to pursuit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uccess of the Britain economic growth or the happening of the modern state relies upon the achievement of decision efficiency and enforcement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e coincidence of these two kinds of efficiency is also the outcome of the efforts to pursuit to their group survival.

And we thought that the new system is the result of the efforts in willingly constructing effective public economic system by elites, who have enough altruism in their actions which depends on the conditions or environment they faced. Of course, the logic of the efforts of elites to change system in order to facing challenges derives from the assumptions that there is a normal distribution of ability and altruism among members of groups, and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survive individually in the ancient times by themselves, even they are elites. As a necessary survival strategy, the elites are willing to be leader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and overlook the externalities. To the opposite, those groups with some selfish elites will disappear in the group struggle for survival for there is no enough followers. Finally, the civilized states with efficient governance structures, which come from the social evolution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will spread over the globe and develop some political system and education system to encourage altruism, especially among elites. In one word, the mode of elites' altruism action supplies a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explanation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However, both of the modern states and the ancient states are a type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 ancient one has more revolution value as the first formal governance structure, even the modern one have more advantages i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if we realize that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is just a way to contribute public goods, there will be no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models, because all people will enjoy efficient systems. The only conflict comes from the group interest struggle which is the goal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even in a modern state with an enough per capita national income. Even more, as a reasonable result, the group interest struggle in developed economies also leads an inside conflict between the weak people who stress the demand of survival public goods such 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elite people who concern more on the demand of developmental public goods, especially those market economic conditions.

**Key Words:**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state governance; public economy

(责任编辑:月 才)